

春在枝頭已十分

讀陳建守編《史家的誕生》

莊勝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史家的誕生：
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
陳建守主編，戴麗娟等譯，時英
9709/451頁/21公分/350元/平裝
ISBN 9789866653148/601

發軔於上個世紀八〇年代的新文化史風潮，展演至今已近三十個年頭。1987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舉辦一場跨國性的文化史會議，並在會後由Lynn Hunt主導，將其中對於文化史發展具有啟發性的思想、理論和新研究類型集結成冊，於1989年出版《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書，並正式以此書名做為這一波研究風氣之學名，不僅表明這是一道新的學門，亦藉由說明歷史研究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來區別其與社會史和傳統文化史間的不同關懷，為新文化史發展的第一個十年下了註腳。而自1960年代以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間接觸頻繁，不僅史家援引社會科學理論治史，社會學者亦轉向歷史研究，由是不僅史學界受文化轉向風潮影響，社會科學界也同樣感染此風。然而兩造的反應並不相同，在一些學科判準上，

仍可分辨個別的學風。史學界深受Michel Foucault與Jacques Derrida學說的滲透，衝擊史家對於客觀、獨立的真實之看法；然而社會科學卻仍遵照其學科準則，對各式各樣的文化表述形式採取謹慎的態度。不過，Pierre Bourdieu所提「慣習」（habitus）與「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概念卻對社會科學帶來深刻的影響，使得他們與文化史家之間產生了共同的關懷。新文化史的第二個十年，便是將焦點集中於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在因文化分析而起的議題上，雙方互動的過程。對此，Lynn Hunt與Victoria E. Bonnel合編了《超越文化轉向》（*Beyond the Cultural Turn*）論文集於1999年出版。今年（2009）將屆第三個十年之尾聲，新文化史的走向又有何轉變與反省，想必令關心這波思潮的讀者引頸期盼。在真相未明之前，或可從2008年出版的《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中，窺得些許端倪。原因為本書除了蒐羅影響當代新文化史走向甚鉅的十位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相關的訪談錄、研究回顧及史家自述外，更有一篇懸疑性十足的回顧性文章——〈「新文化史」存在嗎？〉。



在進入內容介紹前，本文欲向讀者透露本書的成書經過。本書的編者陳建守先生是筆者自大學以來的舊識，在當時便已展露對新文化史思潮的濃厚興趣，並陸續發表近十篇的評介文章。其中以介紹英國史家Peter Burke的兩本著作，來總結他對新文化史看法的〈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最具代表性。同時，他本欲更進一步以Burke的史學理論為題攻讀碩士學位，並打算在碩論完成後，改寫成傳記的形式介紹給臺灣讀者。可惜在陰錯陽差之下，這個期望未能如願，他改而操作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並轉向編輯這本文化史家的訪談性書籍。本書乃為彌補他錯過的計畫而出版，但幸運的是讀者將不僅止於認識Peter Burke的人生歷程，還獲致其他九位史家的，可說十分划算。

本書引介的史家先後出場之順序按照年齡大小而定，讀者將會從被喻為新文化史開山祖師的Natalie Davis於哈斯金斯講座一場精彩的演講開始，一路走訪至壓軸的新文化史定名者Lynn Hunt，在來自英、美、法、義的史家合組的嘉年華會中，對其生平、學思生涯、治史經驗談或中心思想進行一趟學術之旅。過程中讀者將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和顛覆的發現，諸如Natalie Davis早在大三那年就走入婚姻，其後更遭逢被誣為共產份子的困頓人生，期間她是如何在左手把屎把尿之餘，右手還能不斷操作歷史的原因。還可順道知曉名著《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的原形，是16世紀一位法官所寫的《令人難忘的審判》（*Memorable*

Decree）；Hayden White認為一般史家藉由史料生產歷史知識這個產品，而他的興趣則在分析產品本身。所以他自評不是後現代主義者，只是用非正統的方式來操作文化史；Daniel Roche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運中，擔任全國中學教師工會的要角，獲封「巴黎大學的貝利亞」之稱號。他崇尚團隊治史的方式，相較於一般史家習慣單打獨鬥操作史料，顯得十分特殊；Alain Corbin起心動念寫作名著《大地的鐘聲》（*Village Bells*）是源自於他曾親眼目睹一場發生於1958年的諾曼第鄉村小鎮中，為了修復教堂鐘樓使得當地居民分裂的爭議事件；Peter Burke曾在18歲時遠赴新加坡服役一年半，此經歷致使他有著如人類學者般的洞察力去操作多元的文化史議題。但這位多產又博學的史家，一生竟未領有博士頭銜；Robert Darnton的雙親與弟弟都從事記者的工作，他本身也跑過新聞，並養成尊重讀者的習慣。隨著發現STN檔案的來龍去脈，開啓了他各式各樣的閱讀、書籍史研究，以及對「文學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的憧憬；Carlo Ginzburg廣為人知、以微觀手法研究16世紀磨坊主曼諾齊歐（Menocchio）世界觀為主題的《乳酪與蟲子》（*The Cheese and the worms*），只是研究宗教裁判所檔案中的小插曲，這本書也不是他最滿意的作品。其畢生致力研究的乃是女巫審判和庶民信仰之間的關係；Dominick LaCapra區別人們在歷經大屠殺後所記錄的創傷，有「宣洩」（*acting-out*）與「消解」（*working-through*）兩種特性，而史家即使無

法完全彌補，也該盡量設法恢復加害者從受害者身上剝奪的尊嚴；Roger Chartier藉由探究「論述」（discourse）與「實踐」（practice）之間若即若離的複雜關係，闡釋他所理解的Michel Foucault不像一般認為那樣悲觀與反人文主義；Lynn Hunt的母親以女性身份投身政治事業對她產生極大的影響，她更在1960年代末期與女性主義邂逅後，開始以此重新塑造歷史的詮釋。

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亦可覺察本書主角們不斷在辯證其對於史料、史實和理論的態度，當中隱含他／她們對「何謂歷史？」命題的解釋。為本書導讀的盧建榮提出，站在歷史相對主義光譜兩端的史家，基於對史料與史實不同的懷疑態度，而衍生出兩類不同的操作方式——認為歷史是建構而成史家關注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相信歷史仍得以求真的史家則關心人類感知和體驗的經驗。因此，過往普遍認為Natalie Davis《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一書的史料解讀方式，可以彌補Emmanuel Le Roy Ladurie《蒙大猶》（*Montaillou*）與Carlo Ginzburg《乳酪與蟲子》方法論上的缺陷，現在或許應該修正為，這是因其分處歷史相對主義的兩端，對史料呈現的內容所抱持的懷疑態度有別所致，而非孰優孰劣的問題。像Carlo Ginzburg這樣仍對真相情有獨鍾，並大力批判Hayden White太過於強調「再現」的概念，也將後結構主義者否認客觀真實存在的看法，斥為「德希達垃圾」（Derrida trash）的史家，在他認為證據仍可引領研究者通往

真實的道路之時，Natalie Davis解讀檔案的手法非其首選。

閱畢本書後，讀者除了可以領略新文化史研究課題的百官之富，更能對其引發的後續問題了然於胸。諸如過於運用文本和語言典範進行文化的研究；過度強調文化的能動性，言必稱文化的結果造成文化與社會的關係脫鉤；加劇歷史研究瑣碎化的代價等等。這些問題在各文化史家心中，有不同的態度與解決之道，當然其中不乏相反的看法，值得讀者細細去領略。而10位史家當中不僅檢討、更提出最多反思者，非Roger Chartier莫屬，可從本書特別收錄的〈「新文化史」存在嗎？〉得知其中梗概。文中先從新文化史家喜談的「心態」（mentalities）著手，分析此研究態勢由盛轉衰的過程，並藉由Carlo Ginzburg與Geoffrey Lloyd的批評來說明人類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複雜性，不可能會有一個簡化、同質且單一的心態存在。其次為即使文化史已蔚為主流，研究者仍難以給予專屬的定義，此由「文化」一詞的多重含意所造成。接著，他進而探究批評式的研究取向之缺失，和庶民文化的研究視角之缺陷所在。最後，Chartier以新文化史家看待「論述」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收尾，關於這點，或許應該回頭看看書中關於其著作《如臨深淵》（*On the Edge of the Cliff*）的研究討論文章。此著分析論述和實踐間互動的複雜性，指陳權力的論述從未能達成靜態的宰制，因為總被一般人的實踐所抵抗擊退；實踐的抵抗也從未完全成功，因為總是不斷出現新的宰制



形式。Chartier藉此論說各文本之間並未存在一種單一、潛在而根本的世界觀，也沒有共享一種普及於相異生活環境的做事方式。史家若要破解人類的行為邏輯，不該運用語言分析的方式，而要從人和周遭物質世界互動的方式中找尋。一如讀者和其他消費者在閱讀實踐過程中，並非呆板地被作者與其他權威人士的論述所宰制而通盤接受，相反地，讀者運用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手段來爭取文本掌握權，而不同社會背景的讀者群有不同的挪用方式。因此，他提倡理解社會秩序與論述秩序之間的關係，指出復興社會史的需求。

Chartier寫作該文的目的不在於否定新文化史的存在，實乃Lynn Hunt於1989年賦予了新文化史一致性的研究特徵，不僅此一致性本身就是個問題，也無法概括其後十幾年間所產生的多樣性的課題、方法與理論，已到須加檢討及修改的地步，特別是新文化史的操作本就不在追求統一性，而在豐富歷史的多樣性內涵。這種檢討與Daniel Roche在訪談過程中聲稱，沒有真正的年鑑學派之說相仿。在本書另一篇導讀中，秦曼儀為讀者揭示Roche之言亦非否定年鑑存在與影響力的事實，而是警示一味以年鑑學派作為判準，來評斷研究者的身份與學術性格的論述方式，會產生排他性的效果，使得不獨為年鑑專有的法式新史學之運動過程無法被獲知。兩位法國史家語重心長的論調，想必會讓讀者在閱畢本書後留下印象深刻。

最後，本書尚有三個特色不得不提。首先，本書從聯絡、編輯到翻譯與出版，全憑學生之力斡旋而未有任補助與計畫的支撐，不僅感受到年輕一輩的創造力，也是新文化史種子在新一代研究者身上開花結果的明證。事實上，即便未知是此思潮帶來影響，「文本」（text）、「再現」、「論述」、「敘事」（narrative）、「他者」（others）等接踵文化史發展而來的觀念，早已在新生代研究生的操作課題中不脛而走，看待材料與書寫的方式，已逐漸擺脫傳統的視角及習慣，使各類著作中瀰漫濃厚的文化史氛圍。因此，眼下應當從摸索什麼是新文化史、爭論臺灣學界是否適合發展新文化史的層次跳脫出來，晉升至探究如何將其挪用成更合適於研究材料的操作方式，俾便與西方史界接軌與對話。其次，要讓新一代研究者更加瞭解文化史學風，瞭解其領頭人物的治史信念將是一條捷徑，此即本書中E. H. Carr那句一再被提及的名言「研讀史籍之前，必先研究其作者。」所措意之處，亦具體呈現本書的核心價值。最後，如同本書的編者一樣，這些文化史家同樣有其自小就心儀的大師、對後輩史家的建議，或是心目中該推薦給未來歷史學者的經典書單。本文打算賣個關子就此打住，並非吝於告知，而是應該尊重這些文化史家所持開放、多元的態度，讀者應該針對各樣不同的建議與見解，試著去找出最合身的說法與書目形式。或許這才是文化史家們所樂見的。